

孔子的哲学思想

严北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B222.2

12

2/98/07

孔子的哲学思想

严北溟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01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1 5/8 字数 29,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2074·211

定 价：(八)0.15元

封面设计：赵 曙

、 引 言

孔子是我国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說，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的旧中国，在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发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哲学思想方面，更一直处于正統支配的地位。直到“五四”前后，随着新文化革命运动的浪潮，孔子学說的地位和影响才受到了空前有力的冲击。“孔家店”打倒了，虽然几十年間，从北洋軍閥到国民党反动派，一切封建复古主义者总是以“尊孔讀經”为号召，企图“旧店新开”，挽救这封建文化的中心堡垒，然而大势已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反帝反封建文化战綫上取得了輝煌的胜利。

在今天，我們不仅早已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且已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的胜利。我們的社会正經歷着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旧的东西在死去，一切新的东西在生长。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我們对这古香古色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学說又应该如何看待呢？

早在一九三八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这样指示我們：

“学习我們的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給以批判的总结，是我們学习的另一任务。我們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对于这些，我們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們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們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們应当給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貴的遺產。这对于指导当前的偉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主席这番話是我們研究和評價包括孔子在內的历史哲学人物的最高指导原則。我們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世界高峯来看待前人哲学思想的，我們对待孔子的学說思想，过去不是，今天也不是要單純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問題，而是批判地总结和繼承历史珍貴遺產的問題，这也是我們建設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那么，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哲学思想体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先要从孔子的时代背景和先行思想談起。

一 孔子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与先行思想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中国奴隶社会，从公元前十四世紀殷族建国到公元前五世紀的春秋末期，已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中国奴隶制的特征，是較多地保留着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残余。在这社会內，由血緣紐带联結起来的氏族貴族集团，是全部土地和生产資料的所有者，而生产进行则采取家族奴隶劳动力的組織形态。这样，氏族貴族所有的生产資料和家族奴隶劳动力的結合，就一直成为这个社会的基础；基础通过它的上层建筑——金字塔式的世襲等級制度和宗教迷信的神权統治，把这个基础巩固起来。在公元前九、十世紀的西周时代（即儒家盛称的所謂“文、武、成、康之治”），中国奴隶社会达到了它的全盛期。

到了西周末年，特别是春秋中叶，鉄的发现和鉄制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奴隶經常的起义，以及統治階級內部——各諸侯国家之間为爭夺土地和劳动力而引起的頻繁不息的战争，开始把东周奴隶社会引向解体的过程。新的生产关系萌芽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逐漸起来代替

貴族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土地本来不可以买卖，现在可以买卖了，商品生产和商业集中的城市也发达起来了。代表新生产力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商人、手工业者、自由农民等站在一边，向死死维持政权不放的旧贵族展开了斗争。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十五年），即孔子出生前四十一年，鲁国的“初税亩”（开始征用田赋），事实上就是旧贵族在斗争中被迫让步和对土地私有制的公开承认，它标志着新兴地主势力对旧贵族势力斗争的第一次大胜利。

过渡时期新旧势力的斗争，反映在意识形态上，首先是对殷周以来作为维持奴隶主残酷统治的原始宗教迷信的开始怀疑。历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的幕布揭开了。进步势力在和宗教世界观的斗争中，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科学知识水平提高的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同宗教神秘主义的斗争，是这个时期哲学史上两条战线斗争的中心问题。

让我们简单地看看当时思想界的情况吧。

在一部最早的古代诗集——“诗经”中，我们看到古代的民间诗人怎样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转向对宗教信仰的怀疑，从对地上统治者的控诉转向对上帝的批判。他们愤怒地讽刺了那些寄生剥削者的贵族们：

“大老鼠！大老鼠！

不要吃我的黍。

白养了你三年，

一点儿不给我照顾。”（“碩鼠！碩鼠！无食我黍，三岁贯

汝，莫我肯顧。”——“魏風”“碩鼠”)

“耕種收割你不忙，

凭什么千綱萬網收進倉？

上山打獵你不帶，

凭什么你家鷄鶩挂成行？”(“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鶩兮？”——“魏風”“伐檀”)

詩人們更憤怒地譴責了上帝：

“上帝簡直反了，

把老百姓磨折死了！”(“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大雅”“板”)

“上帝呀！

真的要逼得我走投無路嗎？”(“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大雅”)

“暴虐的上帝呀！

你的命令是邪僻的。”(“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大雅”“蕩”)

在這些怨憤的詩歌里，雖然並沒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但至少已肯定上帝是暴虐的，邪僻的，不同情人民痛苦的，這就揭露了統治階級把上帝說成是公平正直的欺騙手段。另一方面，詩人們也指出了老百姓遭受災難痛苦的真正原因，又把對上帝的詛咒轉回到對統治者的仇恨。他們說：

“老百姓遭受的災難，並不是天上降下來的，所有紛爭和禍亂，都是由人——統治者製造出來的。”(“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曷咎背憎，職竟由人。”——“小雅”“十月之交”)

所有“詩經”里這類所謂“變風”“變雅”的詩歌，實際上都是西周末年階級矛盾尖銳和宗教迷信的神權統治面臨危機的最好

的反映。

在“左傳”和“國語”這兩部著名的古代歷史著作中，我們更看到春秋時代在統治階級中出現的一批進步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他們對殷周以來宗教神秘主義的天道觀和各種鬼神、妖異、祈禱、咒術、卜筮等迷信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並初步提出了“陰陽”“五行”等朴素的唯物主義思想。

例如，鄭國政治家子產提出“天道離我們遠，人道離我們近，兩下毫不相干”（“天道遠，人道邇，不相及也”）的名言，駁斥了占星術者堅持“禳火”避災的建議（“左傳”昭公十八年）。齊國政治家晏嬰反對國君用祈禱治病，他認為國君，“剝削人民的勞力，掠奪人民的財富”（“斲艾民力，輸掠其聚”），即使祈禱再多些，也抵不住千千萬萬人民群众的怨恨和詛咒（“左傳”昭公二十年）。魯國開明貴族臧文仲認為只要人們“節食省用，努力農業生產”（“貶食省用，務穡勸分”），就能減輕災害，天旱並不干巫師們的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史伯用自然界土、金、木、火、水等五種不同物質的配合說明事物形成的基本法則，並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認為只有相異的東西相結合，才能產生新的事物（“國語”“鄭語”）。伯陽父用陰陽兩種相反勢力的相互排擠和消長來解釋地震的原因，他說：“陽氣潛伏於下不能出來，陰氣逼住陽氣不能上升，所以發生了地震。”（“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是以有地震。”——“國語”“周語上”）這些解釋雖然還很粗糙，但已包含着科學的萌芽，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觀點，它在當時是作為反宗教唯心主義的啟蒙思想而出現的，是和用上帝鬼神的

意志來說明自然界災異現象的迷信觀點根本對立的。

隨着人們對自然界認識的加深和原始唯物主義的產生，思想家進一步從天文學中吸取了表示天體運行法則的“天道”這一思想，用來說明自然和社會各種現象變化的總的規律。例如史墨引了“高岸變為深谷，深谷變為丘陵”（“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這句“詩經”成語，比喻貴族們的政權並不是永恒不變的，從而論證魯國季孫氏的趕走魯昭公（“季氏之出其君”），是合乎“天之道”的行為（“左傳”昭公三十二年）。這在當時是一種了不起的大膽的見解。他們用自然解釋社會，雖然並沒有擺脫“天人合一”的天道觀的性質，但無疑地已滲進了唯物主義的因素。他們承認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是變化無常的，並且企圖把變化理解為對立轉化的過程。這種辯證的觀念，更顯然是當時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在思想家頭腦中的反映。

孔子就是在這一社會變革和激烈的階級思想鬥爭中走上學術和政治活動的舞臺的。我們要研究孔子的哲學體系，除了要了解它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先行思想外，還要簡單地談一下他的生平和他的階級立場。

二 孔子生平及其階級立場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南）人。先世是宋國的貴族，到孔子前三四代遷居魯國時已沒落了。父親叔梁紇是一個武官，在孔子三歲的時候便死去。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少時過的是“貧且賤”的生活；二十多歲時做過一兩回小官，管理倉庫的帳目（“委吏”）和看管牛羊（“乘田”）。後來他回憶說：“我年少時很貧賤，學會了許多粗鄙的技藝。”（“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篇）

此後孔子生平事迹，大致可分這樣三個時期：

一、聚徒講學時期。順應着春秋末期學術從官學向私學轉化的潮流，孔子從三十歲起就開始講學，一面從事政治活動。他是我國古代私人辦學的第一個人（以前只有官學），也是我國哲學史上第一個正式學派——儒家——的創始者。

二、政治活動時期。這個時期包括他五十一歲時在魯國做中都宰和司寇以及帶領學生周游齊、衛、陳、蔡、宋、楚等國，因始終沒有得到實現他的政治理想的机会而最後返魯，為時共約十七年，這時孔子年六十八歲。

三、專力從事文化教育時期。這是孔子的晚年生活，也

是他毕生贡献最多的时期。傳說他的刪詩书、訂孔乐、編写春秋等工作，大約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果傳說非虛，那么孔子在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就留下了不朽的功績。孔子死时年七十三岁。

这就是孔子的一生。現在讓我們来談一談他的階級立場，因为这是分析和評價孔子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出发点。

对这問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孔子站在封建領主階級的立場上。这是“西周封建論”者的一种看法，因牵涉到历史分期問題，暫可勿論。有人認為孔子代表当时“士”的立場。“士”——也就是古代的知識分子，根本不算一个階級，这說法当然不能成立。又有人說，孔子是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这也与事实不符，以下就要論到。更有人說，孔子主張解放奴隶，站在被压迫階級的立場，这就更不知从哪里說起了。此外，有人認為孔子學說是反映向封建貴族轉化的开明的奴隶主貴族的利益，此說比較接近事实。但我認為还不如干脆地說，孔子是基本上站在奴隶主貴族的立場上，比較更符合事实。

事实是怎样呢？

前面說过，春秋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階級分化和階級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如果孔子是站在新兴封建地主的立場，或至少是站在向封建貴族轉化的开明的奴隶主貴族立場的話，就应该从他的实际行动和學說主張中表現出对当时社会变化抱积极欢迎的态度，而不是抱消极抗拒的态度。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有一天，孔子站在河边上，看見奔流不息的河水，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变化就是这样，它是日日夜夜不停的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論語”“子罕”篇）

有人認為这是孔子欢迎变化和新生事物的表示，并用这两句話來說明孔子的朴素的辯証法观点。当然，說孔子看出事物在变化，說孔子哲学中有朴素的辯証法因素，这是对的；但要說上面兩句話就是他欢迎变化和新生事物的表示，却不敢苟同。因为孔子見流水而发感慨时的心情究竟具体内容是怎样，不應該孤立地从两句比較抽象的話来看，而應該联系孔子全部学說主張和实际行动来考察，这样，我們就可以看出孔子当时的感慨，并不是什么欢迎变化中的新事物，而只不过是對旧事物的消逝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罢了。

这里且举些具体例子来談。

大家知道，“論語”这部书是孔子的学生們筆記下来的，是他們对老师平日言行的一部記錄。这部記錄是比較可靠的。从“論語”的記載中，我們看到孔子平日在政治上拥护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孔子最拥护的也是他認為最理想而决心为其复兴而奋斗的，就是过时了的西周的典章制度。他說：

“周朝沿用了夏商两代的典章制度，多么丰富多采呀！我是拥护周朝的。”（“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論語”“八佾”篇）

又說：

“假如有人用我，我难道不可以在东方把周朝复兴起来

嗎？”（“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論語”“陽貨”篇）

孔子在政治上最反對的是：

“制禮作樂和出兵的事由諸侯決定。”（“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孔子認為這是“天下無道”的現象；

“大夫的家臣把持國家政權。”（“陪臣執國命。”）

“天下有道，國家的政治權力不會落在大夫之手。”（“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換句話說，政在大夫，就必然是“天下無道”的表現；

“天下有道，老百姓不會議論政治。”（“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換句話說，庶人議政，也必然是“天下無道”的表現（引文均見“論語”“季氏”篇）。

可是當時的事情竟變化到這樣：孔子最擁護、最理想的西周典章制度，或者說奴隸制的黃金時代，已變成一去不復返的歷史陳迹；而他所激烈反對的“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庶人議政”……所有這些在他看來是“天下無道”的現象，恰恰是春秋時代的政治現實，它標志着貴族奴隸主專政的全部機構——從它的最高統治者周天子到裂土封爵的大小諸侯們自上而下一齊垮台的徵兆。這種徵兆從歷史發展的观点看來是好得很，而孔子從他那奴隸主貴族的立場看來卻認為糟得很。

為了挽救所謂“天下無道”的危機，孔子認為首先必須正定名分。當時臣子弑國君，兒子杀老子的事情層出不窮，孔子認為這是亂了名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名分一

乱，“乱臣贼子”就会起来造反，那可实在太危险了。

因此，孔子提出他的“正名”主张来。“正名”的目的，当然并不仅仅是明确一些概念名词，而要“循名以求实”，实际上就是要把那在当时快要名存实亡的西周奴隶制的一套制度恢复起来。

“君要象个君，臣要象个臣，父亲要象父亲，儿子要象儿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

这是孔子答复齐景公“问政”时所说的话。齐景公听了，也颇受感动似地说道：

“对呀！假使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就算有很多粮食，我还能吃得成饭吗？”（“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篇）

再看孔子和学生子路的一段问答：

子路问孔子说：“假如卫君等着你去治理政事，你准备先干什么呢？”

孔子道：“那一定是先从纠正名分开始吧！”

子路道：“老师真太迂阔了，还有什么可纠正的呢？”

孔子道：“仲由（子路名），你怎么这样鲁莽！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就应该采取保留态度。名分不正，说话也就不顺口，说话不顺口，事情就办不好，事情办不好，就会弄到礼乐不兴，礼乐不兴，更会弄到刑罰失当，刑罰失当，老百姓就要惶惶然手足失措了。”（“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

“子路”篇)

可見孔子是如何的重視“正名”了，他竟認為這是做一切事情的開端，沒有這一條是什麼事情也談不到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說，“正名”的真正目的在於恢復當時已經名存實亡的西周奴隸制度，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復禮”，他反復強調“禮”的重要性，“論語”一書中明講禮樂之處四十九章，而“禮”字達七十四見。

那麼，“禮”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禮”就是貴族們按其世襲等級成分所遵守的一定生活方式，是從風俗習慣上維持世襲等級制度的社會規範和道德規範。從“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話來看，被壓迫的奴隸階級是沒有資格講“禮”的，“禮”只是維持貴族之間等級秩序的工具，也可以說是解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重要工具。如果貴族們連維護自身階級利益的“禮”也放棄不講，弄到統治集團內部“禮壞樂崩”，變成一團糟，那又怎能去維持整個社會的統治秩序呢？因此，孔子認為最無法容忍和痛心疾首的事，就莫過於那些公卿、大夫、陪臣等的違禮舉動。例如，魯國的季孫氏採用“八佾”式的大庭舞蹈（“八佾舞于庭”——八佾是八行，每行八人，共六十四人，這只有天子才能用，諸侯只能用六行，大夫只能用四行），這是大夫越級僭用天子的禮樂。孔子聽了大罵道：

“這件事可以容忍，那還有什麼事不可以容忍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

孔子對管仲是一向推重的，但因他家門內立了一個照壁（“塞門”），堂上設有招待外賓時放酒杯的台子（“反坫”），是僭用了

国君的礼制，孔子也大罵他“器量狹小”（“管仲之器小哉！”）和“不懂礼节”（“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

这样的例子，“論語”上記載很多。当然，孔子所講的“礼”，并不是仅仅拘泥于“礼”的某些仪式，他是把它看作关系到統治階級内部的秩序是否稳定，能否繼續維持統治的大事情。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是坚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一条原則的。“礼”是維持統治階級内部秩序的工具，上面已經說过；“刑”是专门用来維持貴族們对奴隶和农民的殘酷統治的。“刑不上大夫”，大夫已經是貴族，当然不受刑罰制裁。但在春秋末世，“礼”固已失去了它原来的規範作用，“刑”也有扩大范围伸向貴族階級的趨勢。这是一种进步的趋势，是在新兴地主、商人和自由民等兴起以后經過新旧势力的严重斗争，特別表现为“礼”与“法”的斗争所达到的結果。孔子主張礼治，反对法治，它的实际意义除挽救奴隶主統治的危机、阻止新兴階級抬头以外，找不到其他解釋，这于孔子反对晋国鑄刑鼎一事，更可看得明白。

“刑鼎”是鑄有“刑书”的鉄制的鼎。“刑书”等于一种成文法，它規定貴族和平民之間在法律上稍为获得一点公平的待遇。当时晋国在开明貴族范宣子的主持下鑄制了“刑鼎”，應該說是一种比較进步的措施。但孔子听到这消息却大不以为然地說：

“晋国快要亡了吧！簡直在胡鬧。按理，晋国應該遵守它的祖先唐叔那套制度来統治老百姓……要使貴賤严格区别开来，才算合乎法度……現在放弃这种法度来鑄造什么刑鼎，奴

隶也列上了鼎，又怎样显示出贵族的尊严呢？贵族又怎样维持它的统治事业呢？贵贱无别，这还成个什么国家？”（“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无序，何以为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挽救奴隶制危机的政治抱負，当他一度为魯国司寇时，就得到了实现的机会，時間虽短，却做了两件有名的事：一是杀少正卯，一是毀掉了三座城市。

少正卯是魯国革新派的人物，从被宣布的罪状中，如什么“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众”，“言伪而辯”，“行辟而堅”，“順非而澤”等等，我們正可从反面看出他是怎样鼓吹革新，反对礼治，很受群众拥护而和孔子立于政敌地位的一位人物。孔子的杀少正卯，連他的学生也并不贊成而提出过質問的。这件事不見于“論語”“孟子”等书，直到“荀子”（“宥坐篇”）才予以正式揭載，后来，朱熹又予以否認。我們认为，与其相信道学派的朱熹，不如相信唯物主义者的荀子，因为荀子毕竟也还是儒家，他决不可能毫无根据地捏造出这样一件事情来的。

在春秋末期，各国出現了许多新的城市，这种城市已不象过去那样只是諸侯貴族的营垒，偏于政治上的意义，而是适应着封建经济发展，朝向地域性轉化的新兴城市。魯国境内分由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主持建筑起来的費、郕、成三城，性质正是这样。三家在当时是較早地开辟私田，把奴隶轉变为农奴的开明貴族，当然要成为孔子“張公室”的打击对象。孔子